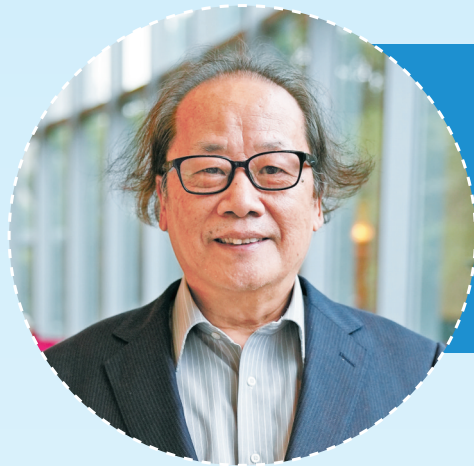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王勇。(孙宇卓 摄)

人物名片

王勇，浙江大学文学院的求是特聘教授、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，曾任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专事日本历史文化、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，2015年因首创“书籍之路”理论获“国际交流基金奖”。

核心观点

书籍既是人类智慧的产物，又是可流通的实物。它有一种神奇的“再生能力”，只要落到合适的土壤里，就能繁衍出一个全新的文化生态

“书籍之路”的形成，一个关键前提是汉字作为通用文字的基础，使东亚文化交流达到了一定高度。它的流动，并非偶然的个人行为，而是上到国家策略、下到民间交流都呈现出有组织、有计划特征

在传统陆地中心的王朝视野中，宁波是“边陲”；在海洋文明的格局里，它却是至关重要的“堡垒”与“集市”。宁波不仅是文化的输出港，也是文化的接受港，我想用“吞吐”二字来形容——它既有胸怀输出文化，也有气度接纳回流

我们要系统性发掘宁波的历史遗迹与文化记忆，将其转化为展览、出版物和学术成果，掌握对话世界的坚实内容。同时，也要将宁波打造为东亚文明研究的国际平台，充分发挥宁波在东亚文化交流中贯穿古今的重要枢纽作用

记者 张蕊蕊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，均由宁波市文化与广电旅游局提供



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部的朱舜水纪念碑。

王勇：宁波为海上“书籍之路”锚定坐标

今年是宁波当选“东亚文化之都”十周年。凭借着深厚鲜活的文化基因、不可替代的文化交流地位及独特的区域文化影响力，宁波再次成为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目光聚集之地。

以“海丝古港·东方起点——东亚文明互鉴与未来共创”为主题，宁波当选“东亚文化之都”十周年系列活动之“文都对话”近日在宁波举行。

站在东亚文明互鉴的视角，浙江大学文学院的求是特聘教授、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王勇以一条飘着墨香、承载着思想的海上“书籍之路”，进一步深化了宁波“书藏古今，港通天下”的独特文化标识。



宁波当选“东亚文化之都”十周年系列活动之“文都对话”。

东亚坐标中的“书籍之路”

记者：您在20多年前就提出“书籍之路”的概念，并且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。可否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“书籍之路”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？您觉得提出这一概念的必要性在哪里？

王勇：“书籍之路”的概念，最初见于1996年出版的中日共同研究项目成果《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·典籍卷》。这一概念的提出，源于我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理论的反思。

传统西方学者的观点普遍认为，文化交流主要依赖“人”与“物”两种媒介。然而在东亚语境下，这两种方式都存在明显局限：

一方面，由于浩瀚海洋的阻隔，古代东亚各国之间（尤其是中日）的人员往来极为困难。明代以前，真正有学问的中国儒学家几乎未曾抵达日本。唐太宗在位期间，曾对首次来唐的日本遣唐使表示“矜其道远，敕所司无令岁贡”，将日本视为“绝域”。

另一方面，虽然“物”的交流确实存在，但器物本身不会说话，交流的深度是十分有限的。比如中国的丝绸很早就传入了西方，但其背后复杂的制造技术并没有一同传递过去，甚至西方因为其自身“牧羊”的文化背景，产生了流传数百年的关于“羊毛树”的传说。

基于这样的反思，我提出以“书”作为文化交流的第三种路径——书籍既是人类智慧的产

物，又是可流通的实物，具有双重属性。

根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日本使者会把唐朝赏赐的钱财，“尽市书籍，泛海而还”。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的遣唐使、遣明使，他们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“求购书籍”。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。

再者，书籍有一种神奇的“再生能力”，只要落到合适的土壤里，就能繁衍出一个全新的文化生态。由此，“书籍之路”的提出，不仅弥补了传统理论的不足，更凸显了书籍在文明传播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。

记者：您有一本名为《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》的专著，梳理古代东亚文化交流中书籍承载的知识迁移现象。您觉得“书籍之路”这一概念对于东亚文化交流的研究和理解，具有怎样的独特价值？

王勇：“书籍之路”的形成，一个关键前提是汉字作为通用文字的基础。

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其1877年所著的《古代社会》中提出，文字发明及应用、工业与艺术生产兴起、国家形成、生产力发展等，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性特征（这一理论后来也被马克思、恩格斯继承发展）。当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周边地区尚处于“只有语言没有文字”的阶段时，汉字传入并被

采纳为其最早使用的文字，从而为整个东亚文明奠定了共同的“底色”。

公元5世纪初，汉字（以《千字文》《论语》为代表的童蒙读物）和儒家经典，通过朝鲜半岛络绎不绝传入日本。日本流传着一句描写学堂的谚语，“劝学院里麻雀叫，听来全是《蒙求》音”，足见中国典籍文化浸润之深。

正是凭借汉字这一共享符号，书籍在东亚的传播无需经过翻译，就能直接被日本、朝鲜等国知识阶层阅读和理解，使东亚文化交流达到了一定高度。

再者，“书籍之路”的研究展现了东亚文化交流的系统性与双向流动性。它并非偶然的个人行为，而是上到国家策略、下到民间交流都呈现出有组织、有计划特征。

我们的研究发现，日本方面也并非随意购书。在遣唐使出发前，日本佛教最高机构会向全国寺院统计所需书目，然后整理成书单交给遣唐使按图索骥。这种系统性的引进和抄写保存，也让不少中国本土散佚的典籍在日本得以留存，而后又回传中国，实现了典籍环流。

还有一点颇具启示意义的是，从“书籍之路”更能看见文化的韧性。即便是在官方关系断绝、贸易时冷时热的时期，通过书籍进行的文化交流也很难中断，如同“打断骨头连着筋”。所以“书籍之路”这一概念，为东亚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。

由日本僧人从宁波带回去，又被我们的学者重新发现和重视的；再比如，宁波高僧知礼向日本天台宗高僧源信禅师求取已在中国失传的《仁王护国般若经疏》，历经多次艰难往返，这部珍贵典籍最终才从日本回到中国。

所以，这条海上“书籍之路”，就像一个文明的循环系统，让知识和思想在东亚生生不息。而宁波，便是东亚文明环流不息的关键地带。

在宁波发掘与再现“书籍之路”

记者：今年是宁波当选“东亚文化之都”十周年，此次您来参与“文都对话”的研讨会，也丰富了东亚文化交流互鉴的视角。您觉得，作为“东亚文化之都”，宁波该如何利用“书籍之路”的历史背景来促进现代文化交流、增进国际理解？

王勇：我认为关键在于“发掘”与“再现”。

首先，必须系统性发掘宁波的历史遗迹与文化记忆。日本学者已明确指出“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这里（宁波）”，但我们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挖掘还不够。例如，传至日本的陶瓷、书画、典籍，其具体传播路径、模仿样式与文化影响，这些都是亟待整理的宝贵资源。只有将这些历史系统性地挖掘出来，转化为展览、出版物和学术成果，我们才能拥有对话世界的坚实内容。

其次，要着力再现“书籍之路”的“双向环流”精神。历史上的宁波不仅是输出端，也是接收端，文化在双向奔赴中才更具生命力。今天，我们可以主动与日韩等国建立合作研究机制，共同梳理散佚在海外的典籍与文物，将宁波打造为东亚文明研究的国际平台，充分发挥宁波在东亚文化交流中贯穿古今的重要枢纽作用。

日本画僧雪舟到访宁波后，曾留下一句充满禅意与智慧的名言：“大唐无我师，大唐有我师。”这句话看似矛盾，实则深刻。前半句“大唐无我师”是从具体的绘画技法上说的，而后半句“大唐有我师”则揭示了他真正的领悟：当他身临宁波，沉浸于中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时，发现这里的一草一木、整个文化土壤，无一不是他的老师。

希望今天，作为“东亚文化之都”的宁波，依旧能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，在宁波的街头巷尾、山水之间，亲身感知和体验文明的精髓。



宁波天一阁。